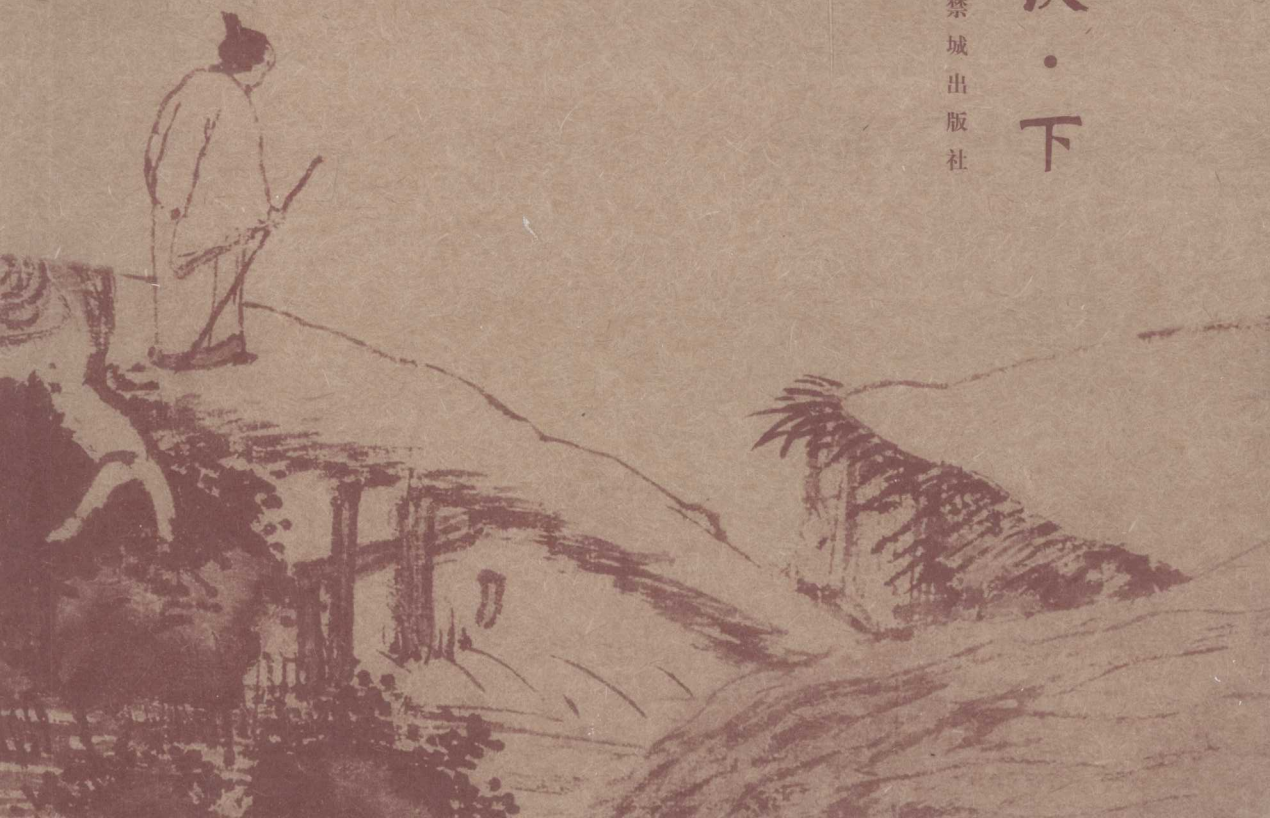


大家史说

人物与掌故丛谈·下

苏同炳 / 著

紫禁城出版社



目 录

光绪帝之死	1
清代科举考试摭谈	36
清代殿试掌故杂谈	49
古代书籍的演变	53
由海源阁藏书说到善本书	60
关于《永乐大典》	75
禁烟节谈往	
——探讨中英鸦片战争史上的一项秘辛	91
财神爷	103
灶王爷掌故	107
古雉礼的遗留	112
满汉席与满汉全席	116
谎说成真的女扮男装故事	120
新年赐福福满身	128
公主与驸马	134

按院大人	137
女巡按	140
从《三门街》说起	143
四川自贡的盐井	150
关于斗鸡的考据	165
《升官图》杂话	168
书中自有黄金屋 ——明代士大夫生活之一般	175
绍兴师爷	184
三百年来的物价变动	196
明清以来签名盖章制度的变化	209
麻将考	213
灯谜丛谈	225
古钱杂话	232
往日的闹场	246

光绪帝之死

清朝的德宗——光绪皇帝载湉，该算得是历史上最苦命的皇帝之一了。他并非亡国之君，照理应安享天家的富贵尊荣，福禄寿考。然而，他从五岁时被慈禧太后选立作皇帝之后，就始终受这个厉害老妇人的挟制。终其一生，根本没有自由意志可言。戊戌变法，他很想效法日本的明治天皇，把老大腐朽的帝国带来自强维新的机运。但因得罪了慈禧及一班守旧派王公大臣之故，变法运动的首脑人物或杀或逃，他自己也被慈禧太后囚禁于瀛台，有好几次并且差点被慈禧所谋杀。光绪三十四年，他三十九岁。那年十月，慈禧病重，眼看被囚禁的皇帝即将苦尽甘来，重见天日。然而，就在慈禧即将咽气的前一天，这位苦命的光绪帝却先慈禧而“崩驾”了。皇帝与皇太后在前后两天之间去世，何况慈禧在病重时还曾怒气冲冲地说过“我不能先尔死”的话，因此，对光绪帝之猝然崩驾，便有颇多传闻，以为光绪实系慈禧所毒死云云。真相如何，由于宫闱事秘，莫能详知。不过，由许多蛛丝马迹所显示，传说之来，亦相当有其事实根据，固不可全以揣测附会视之。

《清稗类钞·宫闱类》“孝钦后谋废德宗”一条说，自戊戌政变后，慈禧恶光绪甚，端郡王载漪遂生觊觎之心，谄事慈禧之总管太监李莲英，欲李莲

英在慈禧前陷害光绪。李莲英不忍，而太监冯某者豺狼成性，愿为效力，于慈禧前多方进谗，遂有立载漪之子溥儀为“大阿哥”及谋废光绪之事。《清野史大观》卷一“溥儀之立”一条记此事，更说，赞成此谋者，以徐桐、刚毅、赵舒翹、杨崇伊诸人为主。这一段史事，亦见于王照所撰的《方家园园杂咏纪事诗》，其第四首云：

扬言不豫盖弥彰，和缓邻医竞荐良。更有谰言寒逆胆，恶声中外口难防。

原诗并有注释，云：

戊戌八月变后，太后即拟废立，宣言上病将不起，令太医捏造脉案，遍示内外各官署，并送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各使侦知其意，会议荐西医入诊，拒之不可。荣禄兼掌外务，自知弄巧成拙。又尝以私意阴示刘忠诚公（即刘坤一），忠诚覆书曰：“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荣禄悚然变计，于是密谏太后，得暂不动。

慈禧欲废光绪及密谋置之死地的计划，虽因外国公使的干涉及刘坤一等一班重要疆吏的反对而作罢，但慈禧自此痛恨外人，欲借义和团驱除洋人，于是又有以后的拳匪之乱及八国联军之役。

撇开这一段后事不谈，慈禧在戊戌政变之后为了谋废光绪而事先宣言光绪病重，行将不起，又令太医捏造脉案，遍示内外各官署及东交民巷各国使馆，由这种方式，可知慈禧如果确有谋杀光绪之意，在外表上必可做到全无痕迹；而光绪若被慈禧害死或毒死，既有脉案宣布在先，任谁也提不出确证可以证明光绪并非因病致死的了。光绪三十四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以“病

死”闻。在此以前，既有慈禧太后“我不能先尔死”的怒语，在此以后所流传的有关光绪帝患病情形的资料记载，又复显示甚多的矛盾及疑窦，因此，对于光绪皇帝之猝然崩驾，便不能不令人致以极大的怀疑——怀疑他此番之死，也许便同戊戌政变以后一样地出于慈禧的密谋，乃是一种有计划的谋杀行为。

为了叙述便利，及使读者对于光绪病死以前的情形可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起见，笔者需要将有关资料在下面先加引叙，然后再逐件讨论其真实性。

恽毓鼎撰《崇陵传信录》，叙光绪晏驾情形说：

德宗天表静穆，广额丰下，于法当寿。颖悟好学。有以圣学叩翁师傅（同龢）者，则以“鲁钝”对，盖知太后忌之，不敢质言也。上素俭，衣皆经浣濯缝纫。声色狗马之好，泊如也。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责问，益战栗不能发语。归自西安，尤养晦不问事，寄位而已。左右侍阍，俱易以长信心腹。上枯坐无聊，日盘辟一室。戊申秋，突传圣躬不豫，征京外名医杂治之。请脉时，上以双手仰置御案，默不出一言，别纸书病状陈案间。或有所问，辄大怒。入诊者金云，六脉平和，无病也。七月二十一日，有大星从西北来，掠屋檐过，其声如雷，尾长数十丈，光烁烁照庭宇，至东南而陨。都市喧传紫微星堕，群讶其不祥。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寿。侍班官先集于薰风门外，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罅未阖，侍班官窥见，上正扶阑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跪拜计。须臾，忽奉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上闻之，大恟。时太后病泻数日矣。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十六日，尚书溥良自东陵复命，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陛辞，太后就上于瀛台，犹召二臣入见，数语而退。太

后神殊惫，上颜色黯澹。十八日，庆王奕劻奉太后命往普陀峪视寿宫，二十一日始返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门增兵卫，稽出入，伺察非常。诸阉出东华门净发，昌言“驾崩矣”。次日，寂无闻。午后，宫中传醇王监国之谕。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于寝宫，不知何时气绝矣。哭而出，奔告太后，长叹而已。以吉祥轿舁帝尸出西苑门，入西华门，皇后被发，群阉执香哭随之。甫至乾清宫，有侍阉驰告太后病危，皇后率诸阉踉跄回西苑。李莲英睹帝尸委殿中，意良不忍，语小阉曰：“盍先殓乎？”乃草草举而纳诸梓宫。时礼臣持殓祭仪注入东华门，门者拒不纳。迨回部具文书来，乃入乾清门，则殓事久毕矣。

这一段记述中有可注意者三点：第一，光绪于三十四年秋间传说有病，征京外名医杂治，其实光绪无病。第二，慈禧于十月初十寿诞时已不适，光绪往朝贺，慈禧借口光绪有病，谕令免朝。第三，十月十九日，太监群出东华门净发，昌言光绪已死，其实光绪系死于十月二十一日。二十日，宫中传出醇王监国之谕。二十一日，隆裕后往省光绪，始知光绪已死。同日，慈禧亦死。前述三点，第一点本可不必重视，因慈禧在戊戌政变后又复实行“训政”，素来所恃的借口即是光绪帝体弱多病。故即使光绪无病，慈禧亦仍召医为光绪治病，以尽其表面文章。到了这一年十月，适逢光绪崩驾，于是，这年七月间的病状，乃特别引起注意。

至于二、三两点，慈禧因患病以至死亡，在慈禧未死之前三日，太监已传出光绪崩驾之说，其中关系，大可注意。这是一项重大的疑窦，足以使人怀疑光绪之死系出于慈禧及诸太监的预先安排，否则何以在光绪未死之前，诸阉即敢昌言驾崩，一若预知光绪必不可能苟延旦夕者然。

《清稗类钞·宫闱类》“两宫先后升遐”一条亦说：“光绪戊申十月十九

日，迎醇王载沣之子入宫，时孝钦后已病笃，尚召至床前。明日，德宗宾天，枢臣草遗诏，孝钦扶病披阅。又明日，孝钦上仙。盖两宫升遐相去仅二（一）日耳。”慈禧在光绪未死之前即为其选立嗣君，又决定以隆裕为皇太后，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在如此的安排之下，光绪已不可能不死。光绪死于非命之说，其原因在此。而反观当时医者所传的光绪病况，则光绪之死，其可疑之处乃更多。

高拜石所撰《古春风楼琐记》，有《谁是毒杀光绪帝的凶手》一篇，其中引述光绪三十四年时为光绪治病的医生杜钟骏所作的《德宗请脉记》，记述光绪于此年七月患病以至十月二十日崩驾的经过情形甚详。根据《德宗请脉记》的记载，杜钟骏于七月中初次为光绪诊病时，光绪确系有病，且其病在“积虚已久”，“非二百剂不能见效”。遂以“二至丸”及“归芍六君汤”为主，拟方呈进。至八月间入值，一太监向杜钟骏夸赞医理甚好，说：“太医开的方子，万岁爷往往不吃，你的方子可吃了三剂。”其后光绪的病情渐变，由腹胀而变为便溏、遗精及腰酸脚软。由于所用医生多至六人，寒凉杂进，攻补并用，杜钟骏的意见未被重视，故而病情日见沉重。至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万寿，御仪鸾殿受贺。翌日，慈禧召见军机大臣，曾有“皇帝的病，越来越坏，头班用的药，完全没有效果”的话。至十月十六日，光绪犹召见臣下。十七日夜间，内务府忽派人传知皇帝病重，催医诊脉。急至内务府，周景焘已诊毕退出，谓皇帝病重。杜钟骏由内务府大臣增崇领至瀛台，为光绪诊脉，退出后至军机处开方，脉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语。内务府大臣继禄谓如此写法恐有不妥，杜钟骏云：“不照这样写，原无不可，若变出非常，实难负此责任，理应事先声明。”旋由继禄回明军机大臣，醇亲王颉谓张之洞曰：“脉案不必写，我们知道就好。”至十九日夜，宫中电话频传，促内务府

预备皇帝宾天仪式。二十日，由早晨候至中午，始有太监二人来传诊脉。至光绪所住之瀛台，光绪方合眼静卧，按脉时瞿然惊寤，口耳鼻一时俱动，似为肝风之象。回至军机处，杜对内务府大臣奎俊、继禄、增崇等人说：“皇帝一定不能度过今晚，不必开方了”。奎俊等坚持须开方，遂写“危在旦夕，拟生脉散”等语而退。其日申时，光绪即告上宾，云云。高拜石所引的杜钟骏撰《德宗请脉记》，笔者未见原书。据高翁所说，此书印刷精美，每版十一行，每行十七字，遇皇太后及皇上等字样均抬头书写，可见下笔时尚在清室逊位前，全书之印行则在清亡之后，“其史料价值较高”。高翁以此书为清亡以前所写，清亡以后所印，其说容或可信，但若以此书系由曾为光绪诊病之杜钟骏所写，其史料价值即因此而“较高”，笔者之意，窃以为不然。谓予不信，可参看与杜钟骏同为光绪诊脉之另一医生周景濂（即杜钟骏所说的周景焘）对当时情形的叙述，并比对其同异，当可知道杜钟骏所记为光绪诊病情形，其中有若干可资采信的价值。

谷虚撰《清宫琐记》中一段云：

太后以帝疾，召医诊视。向例：诸医入内时，预先集议，应用何项方药，亦必先为拟出，以期诊视大略相同，初不计方药对症否也。太医周景濂君与予最善，常侍帝。据云：帝原无大症，诸医皆以平和剂进之。且云：在官中最惨之役，即景帝崩时（景帝即光绪之谥）。当景帝未崩前数日，予即得景帝驾崩之耗，其所宣布之日期，实非确期也。据云，在官侍帝疾时，共有六人，死其二，其余诸医，日仅得一食，因饿失血者又凡三人，请假亦不得出。当景帝宾天之日，晨，内监召太医入，只周君与陈君二人膝行而进。帝在东床卧，以手召周医而前，瞠目指口者四。盖此时内监只有一人，而官中器物，皆被官人偷窃殆尽，只余一玉鼎。

周知帝欲得饮食，然无处寻觅。且周君已两日未食，吐血皆纳诸袖中，彷徨无以为计。旋复见帝转侧吐血盈床，跪近视之，无少声息。近午，醇亲王到，问帝状，周医以“当是驾崩”对。醇王取怀镜接近帝嘴，见无噓气，即匆匆去。旋报皇后至，两医匿于阶下，闻哭声。旋有内监十余人到，人声渐杂，周君及陈君始得出宫。迨出宫外，见街市卖食物者，即就地而食曰：“此是天堂也。”而街市贸易如常，并未闻有人谈及帝崩消息，始知其事尚在秘密也。

《清宫琐记》的作者谷虚，前清时曾供差于内务府，所知宫廷掌故甚多。据他本人所说，这些掌故，“或由目睹，或由传闻，类皆事实，非如外间捕风捉影妄逞奇谈者可比。清廷改革后，市上所售《清廷稗史》及《清后秘史》等书，皆情节离奇，谬妄特甚，于事实皆大相违背。盖其传皆臆度之词，并无其事，不胜其纠正”。《清宫琐记》之作，亦无非作者就事实所见闻者，缀拾数则，以辨明俗传之谬妄而已。《清宫琐记》的作者以他本人所见所闻的宫中琐事笔述为文，如果其中没有蓄意篡改史事的捏造臆逞，则其所记述，理应可信。试将此文所记的光绪死前情状与杜钟骏所记比较，便可知道其中显然有颇多不同的地方。

据《德宗请脉记》一书所说，杜钟骏为光绪治病，最初所见的情形是：“左边尺脉弱，右边关脉弦。左尺弱为先天肾水不足，右关弦为后天脾土不调”，故其症属于“积虚已久”，“非二百剂不能见效”。按此说与前引《崇陵传信录》所记，显有不符。《崇陵传信录》的作者恽毓鼎，在光绪崩驾时充任“起居注官”，地位接近皇帝，对光绪的患病情形知之最稔。他既说三十四年秋间所传光绪不豫之说，“入诊者金云六脉平和无病”，又说，每逢皇太后替光绪召来的医者入宫诊病，光绪辄以预先写好的一纸病情置于案上，令医者

自看，“或有所问，辄大怒”，其意显然因无病而徒为医者所烦扰，不耐之极，故而有触辄发，若“指为虚损，则尤怒”也。

此说与《清宫琐记》所说亦同，足见光绪此时实无大病。而杜钟骏却说光绪积虚已久，需以二至丸及归芍六君汤为主，调脾补肾，非二百剂不能见效云。杜钟骏在当时若果为此说，光绪何以并不动怒，此为可疑者一。杜钟骏既说，此方需服二百剂方能见效，但其后所记宫中太监夸他脉理甚好所说的话，杜所开的方子，光绪总共只吃了三帖，然则杜钟骏在书中所记，光绪初则笑云“你说得对”，继又命“照此开方，不必更动”云云，显然又不能与事实兼顾了。此为可疑之二。

复次，则皇帝有病时召医入诊，诸医例采会诊方式，公拟脉案，由太医院院使写妥呈进，从无分班调换，诸方杂进之事。关于这方面的事例，《翁同龢日记》中记述同治帝“出天花”时太医院院使李德立逐日率同诸医入诊及处方的情形甚悉，何致有以皇帝的性命为儿戏，攻补并用，凉热互投的情形？《清宫琐记》说，“向例诸医入内时，预先集议，应用何项方药，亦必先为拟出，以期诊视大略相同，初不计方药对症否也”，正时这种官僚主义式的诊疗写照。如照杜钟骏所记，在光绪患病时，即使没有太医院院使从中主持，亦决不应有诸方并进，各不相谋的情形。此为可疑之三。有这三项疑点，杜钟骏所撰的《德宗请脉记》，是否涉有捏造史实及自我标榜之嫌，已经大有可疑。而且杜钟骏所记的情形，光绪在十月十一日慈禧寿诞之后，已有“皇帝的病，越来越坏”之说，至十月十七日，更因虚极而有“猝脱”之虞，至二十日入视，口耳鼻一时皆动，似为肝风之象，其病显已危在旦夕。这些记载，如果皆属实在，则光绪确系因病致死，自无可疑。但这里显然也存在两项极大的疑窦：第一，杜钟骏在光绪将死之时果曾入宫诊视光绪之病否？第二，

所说光绪因肝风而致危在旦夕，果系事实否？于此，我们除了以《清宫琐记》所引周景濂的叙述与此互相比对外，更可引征另一项相似的记述，来进一步澄清上述的疑点。

简又文于1936年搜集到一项广东番禺人屈桂庭所口述的文字记录，追记他在光绪三十四年充任北洋医学堂医官时，因庆王奕劻介绍，入宫为光绪看病的情形，登载于这一年所出版的《逸经》杂志，引叙如下：

戊申九月初，因庆亲王奕劻奏荐，张之洞袁世凯世续合词保举，遂于九月十四日清晨至颐和园，由庆王引导，获觐慈禧光绪于园中之正大光明殿。是日，帝南面坐，太后旁坐。行礼毕，太后问余如何诊法？余答：按照西医规矩，须宽衣听察。太后许之，乃如法施诊。按状，帝患遗泄，头疼发热，胃口不进，面色苍白，脉弱脊痛，肺似有癆，但因未验，无法断定。余开方后，注意病人饮食，光绪虽不轻服中医方药，而颇能从余言，故病有起色。无何，冬风起，帝与太后同返北海，余亦每晨改到南海之勤政殿，照常诊病。十月十八日，余到瀛台诊病，见帝正患腹痛，在床乱滚，见余至，呼曰：“肚子疼的了不得！”时中医俱去，左右只余内侍一二人，宫中因太后病重，乱如散沙。余此时诊帝病状，心跳，面黑，神衰，舌黄焦，便结，夜不能睡。各症虽无异状，而最可怪者，莫若腹痛，盖此与前病固绝少关联者。余格于情势，只得告内侍时以暖水熨热腹部而已。此为余进宫诊病之最后一次，其后闻庆王入议继位，未几又闻帝与太后俱崩。

屈桂庭以西医身份入宫为光绪诊病，其所得待遇当然不能与中医相提并论。而由屈桂庭所述，我们对于光绪的患病情形，大致可以得到如下各项概念：

一、光绪的病，自九月间始渐见严重，诊断似为肺结核，但未能确定。

二、在此以前，光绪并不轻服中药。然则虽屡经中医诊视，光绪亦付之等闲。其实际情况，不过是身体虚弱，面色苍白，胃口不佳，头疼发热等轻微病征。自服西药及注意饮食，病渐转好。但至十月十八日往诊时，光绪突患严重的腹痛，且与前病绝少关联，究竟因何致此，无从知悉。大概光绪之致命，即以此。

三、十月十八日屈桂庭在宫中所见，因太后病重之故，宫中乱如散沙，在光绪左右侍病者，只太监一二人。此与周景濂于二十一日入宫所见，光绪卧处只内监一人，室中器物皆被偷尽，只余一玉鼎，光绪饥困之极，欲得饮食而口不能言，唯能瞠目指口之情状，若合符节。由此情状，我们不难想见，光绪当最后病重弥留时，殆已多时不能得到饮食，左右给事之人，无不视光绪如缀旒，各自营私，置光绪于不顾。杜钟骏说，十月二十日将午时，他与周景焘、施煥、吕用宾四人入宫为光绪诊病，甫按脉，光绪瞿然惊寤，口耳鼻一时俱动，此乃肝风之象，断已不治，不肯处方。只因军机大臣坚持要开方，乃写“危在旦夕，拟生脉散”诸语而出。以杜钟骏所说情形与屈桂庭周景濂所说情况相比，显然可以察觉彼此之间的差异。因为由屈、周二人所说可知，光绪之致死，一为极奇怪之腹痛，一为此后的饥饿无食，而杜钟骏乃指为致命的“肝风”，岂不显然互异？此其一。其二，周景濂说，光绪临死时，只他与陈姓医者二人同入诊病，其中并无杜钟骏。况周景濂所说宫中情形，颇能与屈桂庭所说相合，而杜钟骏所说则异是。由此可知，杜钟骏所写，其真实性大有可疑。

高拜石所撰《谁是毒杀光绪帝的凶手》一文，其主要论点，乃是依据了逊清废帝溥仪的回忆录中所说，“光绪非慈禧所毒杀，系袁世凯所为”云云，

又参证屈桂庭及周景濂（焘）所见的情形，确定光绪之死，实系由于中毒。溥仪指光绪之死系由于袁世凯所毒，其说亦颇有踪迹可寻。王照（小航）《方家园杂咏纪事诗》第十八首云：

不容并立势昭昭，閹乐凶谋奉赵高。幸有老奴营救急，暂时收却笑中刀。

原诗注云：

上虽久知韬晦，而英锐之气，往往不能自抑。王士珍之补副都统也。上曰：“你这要与旗人共事了，他们都糊涂哇！”袁世凯之留京议订宪法也，上冷语曰：“你的心事，我全知道。”袁不敢对。八字空言，耐人寻味，适足渐成勾结逆党之决心。凡此等等，实太后所阴喜也。崔玉贵既知太后一日不在则其生命一日不保，而内外上下抱此危惧与之同情者，又指不胜数。上官中旧阉，被太后历年杖杀及他调者已略尽，左右近侍皆玉贵徒弟。玉贵恒对其徒弟叹息曰：“老佛爷活一天我活一天。”其徒有孙敬福者，曰：“师父不用愁，我一个人给他抵偿就结了。”他，指皇上也。孙敬福绰号孙小胖子，侍太后最得宠。一日，皇上宫中忽得太后恩旨，命孙小胖来侍，意甚殷勤，旋有他阉于共宿时窥见其身藏利刃，互相密告，皆大惧，谓一旦有变，同被死罪，乃共于要路伺李莲英至，环跪曰：“我等皆活不了，求大总管救命。”莲英问何事，以小胖子藏刀告之。莲英乃托外间风闻，向玉贵揭破，请其速查。于是小胖不敢动。……旋闻太后调回小胖，而李莲英屡因他事被责，心知太后忌之，遂以老病乞假家居，而官中势力，崔更统一矣。

据这一段记载，可知当光绪三十三年时，袁世凯因忌光绪英明，深恐慈

禧死后光绪亲政，他自己或不免被杀，乃勾结宫中的“二总管”崔玉贵密谋图害，于是乃有孙小胖自告奋勇，欲为光绪“抵偿”之事。这一行刺密谋，虽经李莲英之揭破而中止，然李莲英亦因此深为慈禧所恶，告病家居，宫中势力为崔玉贵一人所独统。关于李莲英其人，王小航的诗中颇多褒辞。《方家园杂咏纪事诗》第十三首：

炎凉世态不堪论，蔑主惟知太后尊。丙夜垂裳恭待旦，膝前呜咽老黄门。

原诗注云：

庚子乱后二宫回銮，至保定，太后寝殿铺陈华美，供给周备，李莲英室次之，皇上寝殿极冷落。官监及内务府诸人趋奉太后事毕，各散去饮博休息。李莲英伺太后已睡，潜至皇上寝宫，小阁无一在者，上一人对灯兀坐。莲英跪安毕，问曰：“主子为何这时还不睡？”上曰：“你看看这屋里，教我怎么睡？”莲英环视之，时正隆冬，宫中除硬胎之坐褥椅垫靠枕外无他物。莲英跪抱皇上之腿痛哭曰：“奴才们罪该万死也。”莲英出，旋抱衾枕至，曰：“今夜已深，不能再传他们，这是他们为奴才所设被褥，请主子将就用之，奴才罪上加罪，已无法也。”上还京后，每追念西巡之苦，曰：“若无李俺答，我活不到今天。”俺答，满语奶妈，盖指李莲英也。由此可知，李莲英在庚子之乱二宫西狩时，对光绪之调护甚为周到，并不如一般稗史所说，惯倚慈禧之势欺压光绪。

《清宫琐记》说，“市上所售《清廷稗史》及《清后秘史》等书，皆情节离奇，谬妄特甚，于事实皆大相违背”，关于李莲英的记述，其情形亦正与此相类。故《清宫琐记》中一则说李莲英并不逢慈禧之恶，一则谓其“性颇豪

迈，遇事亦能持平论断”，其“机变颖悟，公正不苟，盖亦有足多者”。这样的李莲英，当然不会招光绪之怨，更不致恐惧其亲政后或将为自己带来杀身之祸。所以，与袁世凯勾结谋逆者，当是另一个恶迹昭彰的太监，崔玉贵。

《方家园杂咏纪事诗》第六首云：

壁衣牵出难相活，井底胭脂海底怨。南内他年弹泪处，姗姗望断帐虚怨。

注云：

外兵逼京，太后将奔，先命诸阉掷珍妃于井中。诸阉皆不敢行，二总管崔玉贵曰：“都是松小子嗨，我去！”于是玉贵拉珍妃赴井口。珍妃跪地，求一见老佛爷之面而死，玉贵曰：“靡那些说的！”一脚踢之入井，又下以石。辛丑回銮后，上始知之，惟悬妃之旧帐于密室，不时徘徊帐前饮泣而已。

李莲英不敢逢慈禧之恶，崔玉贵则敢悍然为之，其因此而能得慈禧之宠，自在意中。前引《方家园杂咏纪事诗》第十三首续有注云：

自戊戌以后，太后宫中，即二总管崔玉贵独揽大权。因莲英出语谨慎，不敢附和逆谋，故太后疑忌之，以资格仍居大总管之名。

由于慈禧宫中的亲信大太监已是崔玉贵而非李莲英，故袁世凯勾结慈禧亲信的对象，亦以崔玉贵为主。前诗另有附记，云：“袁世凯于京中事先未明了，继合肥督直，专以杨士骧为导师。保定筹备行宫，亦杨所指挥。杨宦京久，酒食征逐，习闻市井之谈，以李莲英为主人翁。故行宫中太后褥垫，皆以黄缎狐皮褥，他物称是，莲英室亦然，普后宫皆无之，以是为深媚太后也，莲英鄙之。至甲辰年，世凯尚遣候补道唐小山者入京，先见莲英的妹婿白寿

山，后见莲英，言欲奏保寿山为保定所练旗军之帮办大臣。寿山不过一内务府郎中，貌堂堂，不甚识字，人却谨朴，力辞之。唐向莲英求其劝白寿山同意，莲英曰：‘归告宫保，寿山不敢遵命，乃我教之也，万勿再罗嗦。’至是世凯始恍然于莲英之无他志，遂改用专媚崔玉贵，卒成大事。”所谓“卒成大事”，无非借崔玉贵以结宠于慈禧，使能久典新军，广植党羽，盘踞内外，终于渐移清祚也。袁既志在篡逆，光绪自为其眼中之钉。何况崔玉贵亦自知结怨于光绪已深，万万不能容其复出。二人同心，而光绪帝之地位乃岌岌可危矣。

《方家园杂咏纪事诗》第十九首云：

袁崔晨夕通消息，线索新加小德张。莫赤匪狐同利害，可怜忐忑肃亲王。

注云：

袁世凯入军机，每日与太后官进奉赏赐使命来，交错于道。崔玉贵更往为小德张介绍于袁。小德张，隆裕官之太监首领也。三十四年夏秋之交，太后病即笃，又令太医日以皇上脉案示中外，开方进药，上从未饮一口，已视为习惯之具文。当日江侍御春霖向李侍御浚言曰：“皇上知防毒，彼辈无能为。”岂料彼辈之用意，不在方药中置毒也。

其下接述睿亲王溥伟议于太后病笃时一得光绪旨意，即率兵入宫保护，而苦于难得光绪旨意，不敢冒险，以与本文无大关联，不具引。

由此可知，慈禧之所以要在光绪三十四年夏秋间即广召医者为光绪治病，即因此时慈禧自身亦感不适，为预先布置杀害光绪之计划，故借此表示光绪多病，以为光绪一旦身死时有所借口。然则光绪必须与慈禧同死，本在慈禧